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三连胜原因探析*

李艳枝**

今年6月13日,土耳其第24届大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揭晓,现任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以49.91%的得票率获胜,这是继2002年和2007年大选之后该党第三次赢得选举。在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土耳其顺利实现从“中东伊斯兰世界国家海洋中一个非宗教指路明灯”到“众多阿拉伯国家民众谋求政治改革的模板”的过渡,这固然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密不可分——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也与正发党的执政实践密切相关——埃尔多安成功地在土耳其建立了一种伊斯兰现代政治的典范。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正发党第三次赢得大选并实现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显然对处于动乱状态的中东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务实开放的政治定位

由于具有深厚的伊斯兰背景,正发党自成立后就引起广泛的质疑和反对,但是作为由传统伊斯兰政党脱胎而来的由改革派组成的新政党,却能根据时局的发展需要进行务实开放的政治定位,这是其保持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民众认可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先后三次赢得大选的重要保证。

在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土耳其政坛先后出现民族秩序党、伊斯兰拯救党、繁荣党、美德党等伊斯兰政党,这些政党多因为与凯末尔主义相抵触而被军方取缔。2001年8月14日,由美德党分化而来的伊斯兰改革派组建了正义与发展党,尽管其在成员构成和领导人方面与前伊斯兰政党有着渊源关系,但正发党在成立后极力淡化其宗教色彩。正发党在政党徽章的设计上抛弃了新月标

志(这是繁荣党、美德党和幸福党共同使用的标识),而代之以一只发光的灯泡,提出“永恒光线”的口号。埃尔多安曾经说道“我们政党明确拒绝成为一个将某种意识形态施加给国家的政党,也不会将宗教道德用于政治领域。”^①“正发党正在试图用一种健康的方式塑造宗教与民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②2004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埃尔多安指出正发党的前身(包括繁荣党、美德党和幸福党等)充分发挥了宗教共同体的功能,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该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中寻求支持者,因而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众基础。以宗教名义建立政党对于宗教而言是不公正的行为,因为宗教仅仅是一种信仰,而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是保持世俗制度,世俗主义是维持宗教和政治之间平衡的重要工具,并使国家保持中立,与所有信仰和宗教保持同样的距离。所以正发党将其界定为中右政党。埃尔多安曾经宣称:“我们中间许多人确实来自某些旧政党,但我们组织这个政党时将那些旧的意识形态放在一边,我们是民主党的继承者,拥有7000万人民,正义与发展党不是任何政党的前身、后世或延续。”

在21世纪初土耳其中右政党——包括正确道

*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伊斯兰视域中的宗教对话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YJC730003)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Yalcin Akdogan,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ve Democrat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54.

② Kenan Cayir, “The Emergence of Turkey’s Contemporary ‘Muslim Democrats’”, in Ümit Cizre ed., *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 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76.

路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分化的背景下,正发党获得大部分中右选民的支持,这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传统中右势力回归土耳其政坛。正发党2002年上台执政后,任命许多具有中右背景的议员担任内务、正义、工业、教育、旅游和文化等部的部长。所以正发党代表了土耳其政坛左右翼实力的重新洗牌,因而在今年的大选中具有左翼倾向的共和人民党成为正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

正发党将“保守的民主”作为政党的主导意识形态。2004年1月,埃尔多安宣称其政党支持保守的民主,认同多元主义和宽容的世界观和哲学观。他说,虽然我们强调宗教作为社会价值的重要性,但利用宗教干预政治或利用宗教改变政府的意识形态显然不合时宜,宗教是神圣的集体价值,不能成为单一政党的工具或导致政党分裂的工具。^①穆克德塔尔·坎(Mukhdetar Khan)指出,正发党代表了民主与伊斯兰认同的调和,以及用和平的方式处理世俗当局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紧张关系的实例,正发党能够控制穆斯林的公共观念,指导土耳其加入欧盟以及确立与西方长久的协作关系。^②伊赫桑·达基(Ihsan D. Dagi)也使用新伊斯兰主义来表达正发党的保守民主,称正发党是一个后伊斯兰主义政党,其在社会事务方面保持了伊斯兰身份,但摒弃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的发展趋势。就其亲西方、自由和民主的倾向而言,正发党不能被称作伊斯兰主义者,而是代表了对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共处的新阐释。^③

正发党采取保守的民主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精英对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力的不信任;二是正发党领导人从繁荣党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将保守的民主认同作为一种赢取合法性的工具;三是正发党的领导人要通过保守的民主来证明其并不是一个反对现行制度的政党。著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阿里·布拉克曾经指出,选民支持正发党的原因在于他们忠诚于宗教和保守的身份,即一种新形式的伊斯兰主义,尽管从未直接提出,但作为一种保守的民主而被传承下来。所以说,这种务实而开放的政治定位使正发党成为除了获得传统的穆斯林,如安那托利亚的农村和小

城镇居民以及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等传统阶层的支持之外,还特别反映了新兴的较为虔诚的中产阶级的期望,因而实际上整合了在西方属于社会党和保守主义政党选民在内的大批中间社会力量。所以说,正发党的社会基础既包括从国家福利中获得好处的社会底层人民,也包括从经济发展中富裕起来的商业中产阶级,还包括通过民主途径进入国家政治核心领域的大资产阶级,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号召力,也使其在土耳其政坛具有无可匹敌的执政优势。

刚柔相济的施政纲领

尽管正发党极力撇清与伊斯兰政党的关联,并整合了土耳其政坛的中右社会力量,但其偏离世俗主义的做法也遭到凯末尔主义捍卫者——军方和共和人民党的质疑与反对。所以在长达十年的执政实践中,正发党在坚持土耳其宪政原则的基础上,在具体的施政纲领方面刚柔相济,体现了一个成熟政党的执政能力。

军方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在土耳其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先后发动三次军事政变和一次后现代政变迫使民选政府下台,先后取缔了三个伊斯兰政党。正发党作为一个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政党,与军方的关系就成为其面对的首要问题。正发党上台后采取较为谨慎的政治立场,尽量避免引起军方的反感;但在地位受到威胁时决然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2003年7月,当正发党议员讨论是否特赦恐怖组织中的未实施恐怖行为的成员时,埃尔多安指出“你们的决策必须与国防委员会保持一致。”^④在是否向伊拉克派军问题上,时任外交部长的居尔指出,军方对此事件的看法是极为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将最终的决策权交给军方,因

^① *Turkish Daily News*, January 31, 2004, <http://www.turkishdailynews.com>.

^② Mukhdetar A. Khan, "Islamic Democracy and Moderate Muslims: The Straight Path Runs through the Middl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slamic Social Sciences*, 2005: 22, p. 43.

^③ Ihsan D. Dagi, "Transforma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Rethinking the West and Westernization", *Turkish Studies*, 2005: 6, p. 34.

^④ Metin Hep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in Turkey", in Ali Çarkoğlu and Barry Rubin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urk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2006, p. 81.

为做出最终决议的必将是政府。当然,不了解军方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不合适的。^①

正发党认为在现代化背景下,文官政府的地位应该高于军方。埃尔多安曾经指出,尽管 1924 年宪法规定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只有出现政治真空时,军方才干预政治;当文官势力衰落时,军方的政治功能才能得以发挥。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土耳其政坛的特殊地位,正发党成员也颇有微词。司法部长杰米尔·奇切克曾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应该成为争斗的场所,也不应该成为滋生争端的地方;一般来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文官向军方报告自己的政策和纲领以获得后者的支持和认可;宪法明确了谁应该对谁负责,作为部长,我向议会负责,而非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②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屯瑟尔·科林克(Tuncer Kilinc)将军公开表示对正发党政府的某些改革议案不满时,正发党副主席麦赫迈特·弗阮特(Dengir Mir Mehmet Firat)回应说“这些不满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然后提交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无权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批评这些改革方案。”^③这说明了正发党并不像其前任政府对军方言听计从,而且试图通过削弱军方的势力来强化其政治控制能力。

头巾问题是正发党与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主义者争论的焦点问题。正发党因其领导人的妻子大多戴头巾,所以与军方在头巾认同上龃龉不断。2003 年 4 月 23 日,由于正发党发言人布伦特·阿瑞恩和其戴头巾的妻子联合组织庆祝祖国独立及儿童节的活动,遭到军方的抵制。2003 年 10 月的国庆日纪念活动中,塞泽尔总统拒绝邀请那些妻子戴头巾的正发党议员参加,结果该活动导致正发党的全体抵制。正发党将取缔头巾禁令作为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土耳其《国民报》主编麦赫迈特·耶尔玛兹(Mehmet Y. Yilmaz)曾说“土耳其必须克服该问题和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论你喜欢与否,我们国家有数百万的妇女戴头巾,还有数百万的妇女不想遮掩她们的头部。谁都没有权力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强加给他人,如果我们不能打破心中的墙,我们将会失去 21 世纪,就像我们失去 18、19、20 世纪一样。”^④所

以,针对头巾问题的争论也是正发党与世俗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所在。经过正发党的积极努力,2008 年 2 月 9 日,土耳其议会以 411:103 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禁止妇女在大学里戴头巾的禁令,后经总统居尔签名后生效。这反映了正发党在重要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与态度。

随着塞泽尔总统的任期届满,正发党为了避免刺激世俗主义者的敏感神经,推出立场相对温和的外交部长居尔担任总统候选人,但仍遭致世俗主义者的抵制。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丹尼兹·巴伊卡尔宣称,如果正发党控制总统职位,这将对最后的共和国堡垒的征服,将使世俗政权处于危险的境地。^⑤军方在其网站上发出警告“土耳其武装力量是世俗政权的绝对捍卫者,必要时他们将清楚地表明其态度和行动。”^⑥该声明被视作军方向正发党政府发出的警告。在总统选举陷于困境时,居尔宣布退出总统选举。对此,正发党通过修宪和提前选举来化解危局。2007 年大选中,正发党再次以绝对优势获胜,居尔也在总统选举中顺利当选土耳其第 11 届总统。随后,居尔极力平复世俗主义者的忧虑,宣称将保持中立和遵守共和国已经颁布的规章制度,支持世俗政权和政教分离,并将独立于各政党之上保持中立,利用自己担任外交部长的经验,推进土耳其融入欧洲大家庭,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正发党成功控制议会和政府,再加上通过头巾禁令,触及了世俗主义者的底限,所以在 2008 年 3 月,土耳其首席监控官亚尔琴卡亚向宪法法院提出取缔正发党的申请,他在长达 162 页的诉状中指控

① Metin Hep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in Turkey”, in Ali Çarkoğlu and Barry Rubin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urkey*, p. 81.

② 同上,第 82 页。

③ 同上。

④ Muammer Kaylan, *The Kemalist: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ate of Secular Turke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5, p. 419.

⑤ Burhanettin Duran,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New Politics: Steering toward Conservative Democracy, a Revised Islamic Agenda or Management of New Crises?’”, in Ümit Cizre ed., *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 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96.

⑥ M. Hakan Yavuz and Nihat Ali Özcan, “Crisis in Turkey: The Conflict of Political Languag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V, No. 3, Fall 2007, p. 120.

正发党企图利用民主方式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法、消灭宪法规定的世俗原则,诉讼的证据包括当年2月通过的允许女大学生在校园中戴头巾的宪法修正案,以及不顾民众反对坚持让有伊斯兰背景和宗教倾向的居尔出任总统。宪法法院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后,于7月30日以6票对5票的结果拒绝了针对正发党的各项指控。埃尔多安总理在判决后强调,宪法法院的裁决将“加强(土耳其的)民主与法治”,“宪法法院的裁决已将阻挡土耳其道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解除。我们的政党从来都不是反世俗活动的焦点。从今以后,我们将继续维护国家的基本价值观”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平”及“民族团结”。正发党成功度过此次宪法危机,是其刚柔相济的施政纲领使然,但这也促使正发党更为深刻地反思其施政纲领与政策,以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作为具有深厚执政经验的政党,尽管改变以前的执政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种转变将是一种现实的必然选择。美国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土耳其专家哈里斯博士(Dr George Harris)说“目前看来,正发党将暂时收敛,放缓有违世俗化传统的改变,但未来的发展还需继续关注。”

富有成效的经济政策

土耳其民众之所以如此倾心于正发党,还在于其富有成效的经济政策、颇具活力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对公平合理的经济结构。土耳其舆论认为,正发党上台九年来土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是其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曾出现严重通货膨胀。1999年和2001年,严重的经济危机两度袭击土耳其,造成土耳其政坛的重新洗牌。经济危机使得主导政权的传统政党——共和人民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在2002年大选中失利,正发党依靠强大的民众支持组建一党制政府,结束了近20年来联合政府更迭频繁的局面,使得土耳其成为中东颇具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正发党上台执政之后,积极推进经济改革,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定和机构改革政策,及时遏制了土耳其经济的下滑,所以在第一个任期内,正发党取得了以任何标准衡量都称得上辉煌

的执政业绩:在一个经济负增长、两位数通货膨胀、贫苦人口超过千万的国家,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6%以上,五年之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个位数,建立了针对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土耳其吸引的外资超过了1980—2000年20年的总和,并与欧盟正式启动了入盟谈判。众多曾经经济萧条的城镇,在五年的时光中奇迹般地崛起,伊斯坦布尔的经济发展,更吸引了众多曾移民西欧的土耳其人回国发展。欧盟负责东扩事务的委员曾评论道,正义和发展党在执政五年期间为推动土耳其现代化所做出的努力,超过了以往任何的世俗主义政党。蝉联执政的正发党很好地保持了经济政策的延续性,土耳其经济已被世界银行等组织誉为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范例。

近几年来,土耳其仅在2009年因受全球经济危机拖累而出现负增长,其他年份的经济发展均表现不俗。尤其是2010年,土耳其成为率先摆脱经济危机的国家之一,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9%。以对土耳其经济至关重要的旅游业为例。世界旅游业2009年遭受重创,但土耳其旅游业的发展好于世界总体水平。2010年土耳其旅游业更是快速反弹,游客数量比2009年超出近300万人次。在外债方面,2002年土耳其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有235亿美元,至2010年已减至60亿美元。目前,服务业占到了土耳其GDP的60%,这意味着土耳其经济是典型的内需驱动型。土耳其年轻人口远高于欧洲,这为该国后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此外,土耳其创业环境很好,按照世界银行对全世界营商环境的调查,在土耳其创办一家公司需要6天时间,而经合组织在这方面需耗时13天。就GDP总量来看,不管是IMF或者世行的数据,也不管是按照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土耳其的GDP虽还赶不上西方七国以及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但已超过印度尼西亚,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地区,其经济实力更是首屈一指,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东大国”。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使大部分土耳其民众看到了动力和希望,他们支持正发党便是现实的选择。

随着土耳其努力融入全球市场,正发党实行的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农业工人和工匠的境况却没有多少改善。但正发党在努力增加资本积累的同时,采用社会民主的办法帮助穷人及失业者,这就化解了由两极分化积郁的政治与社会不满。正发党还热心关注民众疾苦,积极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以补偿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和失败者;注重保护弱势群体,致力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在有关救济、医疗等社会保障系统方面进行改革,使底层民众得到实惠。

埃尔多安在当选总理后,成功打造了自己亲民总理形象,走访普通社区、节假日给孩子们分发礼金和礼物、给贫民送煤炭等举动,笼络了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增加了该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和亲合力,尤其是在不发达的中部和东部等部分选区,其支持率高达60%以上。埃尔多安曾经指出“作为政治领导人,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职位,但是我们的人民将留下来。因此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这种态度无疑会引起更多的共鸣。另外,正发党作为一个民主、市场和现代化取向的政党,在选举运动中宣称要进一步赋予民众民主权利、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发展。所以,当其他政党不能提出与正发党相媲美的竞选纲领时,民众的天平似乎更容易向正发党倾斜。

纵横捭阖的外交实践

脱亚入欧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重要定位。冷战时期,土耳其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和北约成员国,充分发挥了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先锋作用。但是,正发党上台后,充分利用地缘战略地位制定灵活的外交政策。早在担任正发党政府外交事务顾问之时,达武特奥卢(Davutoglu)就强调土耳其不是一个桥梁而是一个核心国家,指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要基于以下五个原则:一是不以安全和稳定为代价的民主化;二是与邻国的良好关系;三是主动的、多层面的、全面的外交政策;四是基于自信的新外交方式;五是从静态的外交向有节奏的外交过渡,以提高土耳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①这就是著名的达武特奥卢主义。由此可见正发党旨在将土耳其从一个地区强国转变为一个全球性强国,据

此居尔在任外交部长时曾经指出“土耳其积极支持一种特定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并基于妥协和双赢来解决复杂的问题。”^②

正发党政府积极推行与邻国的“零问题”(Zero Problem)外交,以对话和合作代替以强制和冲突的方式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并通过积极参与中东事务来提高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土耳其人埃克梅勒丁·伊赫桑奥卢(Ekmeleddin Ihsanoglu)当选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秘书长是其回归中东事务的重要表现。正发党政府还针对中东事务明确表达其观点和立场,改变昔日唯西方之命是从的传统。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正发党政府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次包括土耳其、伊朗、埃及、约旦、沙特和叙利亚等国外长的会议,探索阻止伊拉克战争的方法和形成一个关于伊朗未来走向的共识,居尔以欧盟一体化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地区国家需要从创造“地区协作和安全的多层次机构”中汲取经验教训。^③正发党政府还改变长期以来对塞浦路斯政策的顽固态度,支持欧盟关于塞浦路斯统一的决议,但是土耳其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美国和欧洲的认可而结束对北塞浦路斯的孤立状态。与邻国叙利亚的关系也出现解冻的迹象,2004年1月,叙利亚总统访问土耳其,使得1998年以来因为库尔德工人党事件而恶化的双边关系逐渐回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埃尔多安坚持认为哈马斯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合法领导力量,反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要求提前大选的呼吁,认为必须将哈马斯纳入巴勒斯坦政治体制内,否则无法制止内部冲突。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刺杀哈马斯领导人亚辛之后,土耳其撤回驻特拉维夫大使,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以色列没有促进和平进程,正在杀害妇女和儿童,破坏巴勒斯坦人的房屋,除了‘国家恐怖主义’,其他方式都

^① M. Hakan Yavuz, “Turkish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Flux: the Rise of Neo-Ottomanism”, *Critique*, Spring 1998, pp. 19—41.

^② Abdullah Gul, “Turkey’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TO Istanbul Summit”, *Turkey Bulletin*, Summer 2004, p. 13.

^③ Abudullah Gul, “At the Regional Countries’ Meeting on Iraq, Kuwait”, February 14, 2004, <http://www.abdullahgul.gen.tr/EN/Main.asp>

不足用以表达这种行为。”^①在回击关于其苛刻言论指责时,埃尔多安说“我们的态度是和欧洲一致的。”^②正发党政府还主张黎巴嫩同其国内激进派或极端势力实现和解。埃尔多安参加在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联盟会议时,直接批驳欧盟对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政策,以及坚持那里没有发生“种族大屠杀”,认为那是西方国家编造的谎言。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官和总理出访伊斯兰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而且在同穆斯林领袖谈话中,对欧美频频表示不满,批评西方对世界大事不公正。埃尔多安估计到外交政策的变化将使土耳其失去欧美国家的支持,同时将失去许多经济利益和优惠条件,但希望通过与伊斯兰国家的交往获得补偿,例如同穆斯林国家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认为这种新式的外交定位将会强化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和全球的重要性。今年初,当埃及开罗民众汇集解放广场要求政治改革时,埃尔多安曾向穆巴拉克说“作为穆斯林,我们死后都不过几寸薄土,倾听人民要求变革的声音吧。”6月12日,他又向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呼吁“结束战争,立刻离开利比亚。”^③这充分说明土耳其试图借助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发挥中东地区核心国家的角色,凭借有利的历史契机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地区大国地位和作用。

尽管正发党政府强化与穆斯林国家的联系,但在执政实践中同时也努力维持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认为加入欧盟将会强化欧洲外交政策中的中东因素,将会证明自由民主与伊斯兰教的相容性、欧盟的多宗教包容性,从而有力驳斥文明冲突论。不过,在这里伊斯兰自豪感充斥在其政党话语中。埃尔多安曾经指出“我们的伊斯兰文明通过正义和美学照亮三大洲,而其他文明则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尽管在文明的道路上不停被打断,然而我们正在极力提升自己。我们没有拒绝我们的过去,仍然忠诚于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精神根基。我们继续确立文明之间的桥梁而复兴我们核心的文明(土耳其)。”^④这就改变了以前单纯附属于欧盟的现实而强调了土耳其在入盟进程中的主动作用。正发党指出“华盛顿必须承认土耳其将在中东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功能,但是要沿着服务于土耳其民族利益的

道路前进……土耳其的民族利益正在改变为强化其与地区和欧盟的联系以及弱化美国的核心功能。”^⑤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居尔政府相信没有土耳其的支持美国将不能攻击伊拉克,于是在2003年3月1日否决了一项允许美国地面部队自土耳其调度的动议,此举一度使土美关系降到谷底,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土半个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久,大国民议会认识到与美国协作的重要性,以358:183的投票结果决定派土耳其军队前往伊拉克,但已经太晚,派兵的计划被暂时搁置。总参谋长希勒米·厄兹柯克在2003年11月9日憾称,正发党政府决定不向伊拉克派兵,意味着其在未来中东的政治格局中没有发言权。^⑥最终土耳其以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来挽救陷入冰点的双边关系,但由此证明正发党政府已经放弃了过去唯美国是从的外交倾向。居尔曾说“我们与美国的纽带是基于特定的道德: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⑦过去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关注于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和权力政治的平衡,“它现在越来越理解文官的法律、经济和外交机构的价值。与此相关,土耳其的例子展示了作为国内现代化进程核心的外部停靠站的欧洲一体化的价值”。^⑧这就奠定了其与欧美关系的基调。

(转第14页)

^① Burhanettin Duran, “JDP And Foreign Policy as an Agent of Transformation”,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295.

^② Christopher Caldwell, “The Turkey Paradox”, *Weekly Standard*, 9 July 26, 2004.

^③ 转引自张喆“土耳其大选为中东转型上课”,《东方今报》,2011年6月13日。

^④ Burhanettin Duran,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New Politics: Steering Toward Conservative Democracy, a Revised Islamic Agenda or Management of New Crises?’”, in Ümit Cizre ed., *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 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p. 84.

^⑤ Graham E. Fuller, “Turkey’s Strategic Model: Myths and Realities”,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3, Summer 2004, p. 63.

^⑥ Muammer Kaylan, *The Kemalist: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ate of Secular Turkey*, p. 418.

^⑦ Abdllah Gul, “Luncheon Given by the American-Turkish Society”, New York, September 22, 2003, <http://www.abdullahgul.gen.tr/EN/Main.asp>

^⑧ Burhanettin Duran, “JDP And Foreign Policy As an Agent of Transformation”,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 293.

三是加大对中亚的经营力度。近五年中,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以在阿反恐为核心,曾放松了对中亚的经营。从今年起,从阿富汗抽身后,美国加大了对中亚的关注。首先,高官互动频仍。继美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11月底12月初访问哈、吉、乌三国后,2011年1月,美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苏珊·埃利奥特访吉;同月,哈国务秘书兼外长萨乌达巴耶夫访问华盛顿;3月6日吉过渡时期总统奥通巴耶娃访美;4月11日美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访塔,美国务卿希拉里也计划今年年底访塔。其次,增加经济援助。在2012财年预算总额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援助中亚五国的预算仍维持较高水平,达1.128亿美元,其中吉4080万美元、塔3880万美元、哈1410万美元、土800万美元、乌760万美元,另外约360万美元用于协助整个中亚地区的发展,^①其中吉、塔预计收到的援助总额一半以上,成为美资助的重点国家。再次,“民主”渗透有所收敛。2005年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效果不佳,美国转而实施与中亚国家政府开展合作的

(接第6页)由此说明,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坚持中间路线,希望在欧洲与亚洲之间搭桥,从两面获得利益,避免发生东西两方的“文明冲突”,这种政策有助于营造相对宽松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并有利于在大国和强国中纵横捭阖,从而使土耳其从一个地区性国家转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国家。这种外交战略已经远远超出贯通东西方的功能,它意味着这种模式提供了获得社会和平、经济进步和政治发展的优势,通过巩固民主来解决土耳其自身的问题,如伊斯兰主义和库尔德问题等。正发党的睦邻友好政策削弱了土耳其在世界超级大国心中的中东民主化示范作用,但有利于其地区地位的提升。就目前而言,正发党的外交政策还处于一种试验的过程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面向美国与欧洲的基本政策导向和立场。

总之,正发党的三连胜说明其体现了民众的发展诉求,因而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法国著名的土耳其研究专家多罗塞·舒米特曾在法国《解放报》撰文称“土耳其人表明,伊斯兰国家可以

“鼓励政策”。今年2月,美表示重新考虑针对中亚的人权标准,放缓对乌人权问题施压。4月11日,美与塔政府会谈时,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等问题一带而过,仅对塔禁止宗教活动和关闭清真寺等“深表担忧”。吉实行议会制后,美多次表示支持吉改革和民主建设。3月,为表彰奥通巴耶娃为民主改革所做的贡献,美国政府授予其“国际妇女勇敢奖”。^②

四是借助土耳其在中亚的文化优势扩展影响力。美国重视土耳其作为操突厥语国家在中亚地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资助其编织针对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和开设突厥语网站,赞助中亚学生赴土耳其留学,把土库曼斯坦可作为移植“阿拉伯之春”的“一枝花”,欲借土耳其之手对土库曼斯坦“动手”,以拓展美在中亚影响力。◎

^① “Меня назначили любимой женой! , США назвали Кыргызстан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для помощи в бюджете 2012 года”.

^② Жанна д, “Мрак. Р. Отунбаевой вручаю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награду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США’ Женщина Отваги”, 10: 44 07. 03. 2011.

继续保持伊斯兰特色,但与此同时国家朝着现代化和民主化道路并行不悖。”^①然而正发党是否真能一如既往地成为“世俗伊斯兰国家”的楷模,仍遭到国内外相当多人的质疑。埃尔多安通过修宪为他参与总统竞选铺平了道路,而总统权力的相对膨胀也使得反对派认为其旨在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总统式的政府。目前,尽管正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但326个议席并不能保证其新的施政纲领在议会中获得通过。有分析认为,埃尔多安即将组建的新一届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修改宪法,而要推动宪法改革,就必须求得国内各派的一致,显然这很难获得立场歧异的不同派别的认可。而且,土耳其当前存在的经济过热、库尔德问题、土叙关系、土以关系都是正发党政府颇为棘手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正发党才能顶着三连胜的光环迅速将土耳其驶入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① 转自张喆“土耳其大选为中东转型上课”,《东方今报》,2011年6月13日。